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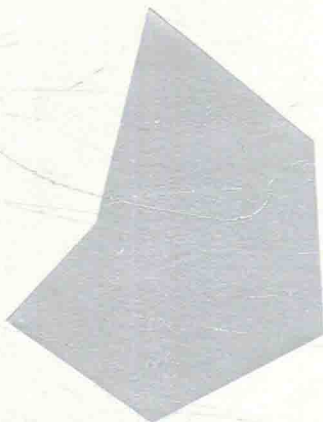
倾向与可能丛书

诸众的语法

当代生活方式的分析

[意] 保罗·维尔诺 著

董必成 译



Grammatica della moltitudine

Per una analisi delle forme di vita contemporanee

Paolo Virno



商务印书馆
The Commercial Press

倾向与可能丛书

诸众的语法

当代生活方式的分析

[意] 保罗·维尔诺 著

董必成 译

Grammatica della moltitudine

Per una analisi delle forme di vita
contemporanee

Paolo Virno



商务印书馆
The Commercial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诸众的语法：当代生活方式的分析 / (意) 保罗·维尔诺著；董必成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7
ISBN 978-7-100-14667-8

I．①诸… II．①保… ②董… III．①政治哲学—研究—意大利②社会语言学—研究 IV．① D095.46 ② H0-0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7) 第 156836 号

权利保留，侵权必究。

诸众的语法：当代生活方式的分析

〔意〕保罗·维尔诺 著

董必成 译

商 务 印 书 馆 出 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 36 号 邮政编码 100710)

商 务 印 书 馆 发 行

浙 江 新 华 数 码 印 务

有 限 公 司 印 制

ISBN 978-7-100-14667-8

2017 年 10 月第 1 版

开本 880×1240 1/32

2017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印张 5

定价：48.00 元

目录

序言：我们，诸众	001
前言	023
人民对诸众：霍布斯和斯宾诺莎	023
曾被驱除的“多数”：“私人的”和“个体的”	027
探究“多数”的三种方法	030
第一天：恐惧和避难的形式	033
超越恐惧／苦恼的这对耦合	034
共同之处和“普遍智能”	041
没有公共领域的公共性	048
哪个“一”属于“许多”？	050
第二天：劳动，行动，智力	057
创制与实践的并置	060

关于精湛才艺：从亚里士多德到格伦·古尔德	062
作为表演艺术家的说话人	067
文化产业：预期和范例	069
舞台上的语言	074
职场中的精湛才艺	077
智力如同曲谱	080
执政者的理由和退出	084
 第三天：作为主观性的诸众	 093
个性化的原则	095
模棱两可的概念：生命政治	103
诸众的情感色调	108
闲聊和好奇	115
 第四天：诸众和后福特时代资本主义的十个论点	 125
 参考书目	 149
索引	155

序言：我们，诸众

保罗·维尔诺的《诸众的语法》篇幅不大，却投射出一道长长的影子。透过这道影子隐现着整个劳工运动史及劳工运动的异端羽翼——意大利的工人主义（operaismo）¹，此流派鉴于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斗争对马克思主义做了重新思考。但是在极大程度上是前瞻性的。抽象智力和非物质的信号在我们生存的“后福特制”经济体系中已经成为主要生产力，正在深刻地影响着当代的结构和心态。维尔诺的这篇论文审视了新型劳动力增强了的流动性和通用性，现在他们的工作时间几乎扩展至他们的整个生命。“诸众”是一种主观形态，这种彻底的改变就是解放，由此引出一个“我们有什么能耐”的政治问题。

工人主义（workerism）因为不认为劳动是人类生活的决定因素，所以，它与传统马克思主义和官方劳工运动之间的关系显得有些矛盾。马克思主义分析认为劳动异化是由资

1 汉译注：operaismo 为意大利语，其意思和英语 workerism 一样，即工人主义。

本主义剥削造成的，但工人主义者却认为那更像是把生活降格到了工作的地步。矛盾的是，“工人主义者”反对工作，反对惯常高举劳动尊严的社会主义伦理，他们不想去重新适应工作（“接受新的生产方式”），而是想减少工作。工会和党派关心工资和劳动条件，却不为改变工人的命运而斗争，他们充其量也只是使情况变得更令人可容忍一些罢了。工人主义者则对减少工作时间，凭借技术知识和社会化的智力做生产改造两个问题紧紧催逼。

20 世纪 30 年代中期，左派哲学家西蒙娜·韦伊（Simone Weil）主动投身于工厂，在生产装配线当第一手，体验了一次可怕的卑屈。她想知道列宁和斯大林是否真的会踏进车间庆贺工人的劳动。当她宣布放弃马克思主义，与有组织的工人运动决裂后，她在写《压迫与自由》（*Oppression and Liberty*）一书时总结道：“因此，问题已相当清楚，这是一个弄清楚是否可以认为生产组织”不会“在压迫下摧毁灵魂和肉体的问题”^①。那时，凭借自动化达到这一目的为时尚早，她的努力陷入孤立；在 20 世纪 50 年代终于由意大利的工人主义者在她中断了的地方捡起。

从意识形态来说，工人主义是由 1956 年苏联对匈牙利的人入侵促成的，此次入侵显露了官僚社会主义的本性。这使得意大利左派中的左倾青年知识分子〔其中有托尼·内格里（Toni Negri）和马里奥·特隆蒂（Mario Tronti）〕看清楚了苏联不是工人的国家，而是资本主义的一种极权形式。在那

段时间，意大利工人首次从贫困的南部向工业化的北部大迁徙，显得更为动乱。年轻的非熟练工人（大众工人）不愿把自己交给新型的规模化生产系统，而是绕过了优先考虑技术工人的老牌工会，猛力抵制福特制生产流水线。工人主义运动在都灵的第一次大规模劳工冲突后于1961年崛起。《红色笔记》（*Quaderni Rossi*）在其创刊号中分析了青年大众工人对劳动力已造成的影响和随着近期资本主义的转变而出现的新的“阶级成分”。1964年出版的《工人阶级》（*Classe Operaia*）杂志阐述了一种新的政治策略——拒绝工作，向资本用新技术发展其生产力挑战。这一“拒绝的策略”（出自马里奥·特隆蒂的一篇开创性的文章）被应用在资本主义发展“之中”，但是“持反对态度”。它预言了菲利克斯·加塔利（Félix Guattari）和吉尔·德勒兹（Gilles Deleuze）于1972年在《反俄狄浦斯》（*Anti-Oedipus*）一书中对1968年后的资本的分析，并在70年代中期把意大利社会思想家和法国后结构主义哲学家联系起来。大众工人最反对的是将人类的知识转化成机器，使生活沦为“死劳动”。那里有一个存在的维度，但是没有积极性和创造性。他们为改变劳动条件所做的努力是传统马克思主义所未知的，他们主要专注于作为压迫手段的机械论及其对工人阶级的影响。

在《朝霞》（*Daybreak*）中，尼采号召欧洲工人去“公然宣布，从今以后，作为阶级，他们是人类的一种不可能性，而不像人们通常所想的那样，只是一种严酷的、毫无指

望的编制”。他还勉励道，“不可能的阶级”应该从欧洲的蜂巢中蜂拥而去，“用声势浩大的自由迁徙这种行动去反对机器、反对资本、反对他们现在面临的不得不（necessity）在成为欧洲国家的奴隶还是成为某个革命党的奴隶之间做出选择的威胁……”对这种大规模迁徙的颂扬在马克尔·哈特（Michael Hardt）、托尼·内格里所著的《帝国》（*Empire*）（“一个幽灵，迁徙的幽灵，在世界游荡……”），一本在美国的马克思主义学者和艺术评论家圈子里的畅销书中可以看到。维尔诺在《诸众的语法》中也以他自己的方式做了补充。人们可以从被叫作沃伯莱斯（Wobblies）的非正统、流动性外来异教劳工中追溯到这种说法的原型，沃伯莱斯即“世界产业工人联合会”（International Workers of the World），该联合会在20世纪20年代组织起遍布美国的外籍劳工（因此，造成工人主义者对美国工人运动及美国总体的一种奇怪的偏爱）。移民作为一种反抗的形式也使我们回想起马克思关于现代殖民的论述，想起欧洲的劳工逃离了饥荒和工厂工作去美国西部的自由土地^②。意大利社会思想家竭尽他们的创造力，把工人们想“成为独立自主的土地所有者”这个愿望的粗略考虑变成了后现代诸众的期望。尽管哈特和内格里认为这种大批逃离是“阶级斗争强有力的形式”，维尔诺提醒道，逃亡只是“一种暂时状态”，其后还隐喻着后福特制工人的流动性（欧洲劳工在东海岸的工厂工作了一二十年，然后继续迁徙）。两者之间也许差别不大，但意义重大。维尔诺和

哈特、内格里不同，他忍住了，不逃亡，也不就此做个诸众，更别说共产主义，因而转入了另一个辉煌的神话。

自治论者（Autonomist）的理论见于许多地方，也包括美国。但自治运动发展最强烈的地方是意大利，从20世纪60年代持续发展到了70年代。年轻的工人主义知识分子摆脱了意大利共产党创始人安东尼奥·葛兰西（Antonio Gramsci）传统的、民粹派的马克思主义，从工人本身了解到生产的现实状况究竟如何。他们帮助工人建立自己的组织，通过罢工和破坏活动抗拒迎面而来的生产系统。工人主义者的这种务实和富有战斗性使它有别于意大利社会思想家。他们反对意大利共产党和葛兰西采取小步伐战略（战场在民间）的霸权，意大利共产党和葛兰西的方针导致欧洲共产主义和执政的天主教民主党（保守派）的“历史性妥协”。工人主义者是第一个对整个社会主义传统的基石——无产阶级中心论提出质疑的，并呼吁对阶级分析的类别做重新评价。“改变阶级编排”的概念由塞尔焦·博洛尼亚（Sergio Bologna）提出，使得他们在工厂和大学里刚出现“新的社会主体”的时候重新把革命斗争作为新主体的中心任务。^③1969年的“多事之秋”以大众工人为获得平等的工资待遇所发起的强大攻势为标志。各种工人主义团体联合起来创建了一个新的组织，包括名称都叫“工人力量”（Potere Operaio）的一个团体和一本杂志。这个组织聚集了一批如马里奥·特隆蒂、托尼·内格里、弗朗哥·皮帕尔诺（Franco Piperno）、奥

雷斯特·斯卡尔佐内（Oreste Scalzone）和博洛尼亚这样的理论家，他们重塑的马克思主义成为整个自治运动的新创意。1974年，由于“红色旅”（Red Brigades）这个秘密行当与工人力量内群众组织的公开形式相冲突而导致该团体的自我崩溃。

工人们和控制生产周期的强大压力遭到了来自特务机关和天主教民主党政府的严重挑衅，这种挑衅是随着1969年米兰丰塔纳广场的爆炸案开始的。政府草率地归咎于无政府主义者，以爆炸案来证明警察以强硬手段镇压工人组织是名正言顺的。这种“高压政策”将意大利撕裂，激起的冲击波蔓延至整个70年代，濒临内战。这在菲亚特工厂的工人中引发了组建地下恐怖组织——其中以“红色旅”和“前线组织”（Prima Linea）最为有名，以产业界的领袖人物和政治界的著名人物为目标。绑架意大利天主教民主党主席阿尔多·莫罗（Aldo Moro）以及在政府中止谈判后“红色旅”残酷地将莫罗处死，进一步打破了意大利的政治平衡。

1975年，工人力量被自治运动（Autonomia）所取代，自治运动是一个由学生、妇女、年轻工人和失业者参加的大型运动。他们根茎式的组织体现了工人主义思想家所期望的各种形式的政治行为——反等级制、反辩证、反代议制。自治主义不是正规的政治组织，是自由主义的、新无政府主义的，在意识形态上开放地、宽松地按地区组成，体现了政治分歧间的互相尊重。自治论者团体只在共同的公开行动方面

进行合作。这个尝试性、创造性的群众运动很难与组织严密、采取“武装斗争”的恐怖组织画上等号。1977年，一名自治主义学生在罗马被法西斯分子谋杀，自治运动终于爆发成为“1977运动”^④。运动横扫全国，自治主义者接管了罗马、巴勒莫、那不勒斯的大学，随后又接管了佛罗伦萨、都灵的大学，最后接管博洛尼亚大学。看上去他们似乎还打算接管意大利。接下去他们到底还想做些什么？皮帕尔诺最近承认他们当时真的不知道接下去还该做什么。在这样的不祥之年，这个运动来的不是时候。挑战来自其最左边，共产党利用“莫罗谋杀案”来剔除自治运动，指控自治主义是“无产阶级武装派”的幕后指使者，所有自治论者的领导人，包括内格里，于1979年4月被逮捕和监禁。其他像皮帕尔诺和斯卡尔佐内处于流亡状态（不是他们自己的选择）。当时在具有影响力的自治论者杂志《大都市》编委任职的保罗·维尔诺遭两年监禁后才洗脱一切指控。（25年后，许多自治论者还仍在狱中。）保罗·维尔诺现在是卡拉布里亚大学传播伦理学的系主任。2001年，他在那里做了三次专题讲座并将其编成这本《诸众的语法》。

马克尔·哈特和托尼·内格里所著的《帝国》没有明确提及这一具有社会和政治创造力的时期，这是有充分理由的。当时美国的左派站在欧洲共产主义一边，而对自治主义持怀疑态度。然而，内格里当时提出的论点却与他现在进一步的阐述几乎没有什么不同。那是怎么回事呢？（反

常的是，在《帝国》一书中，自治主义是以幽灵般的形象出现的，在这一点上它比《诸众的语法》给人的感觉更为强烈，而保罗·维尔诺对这一点是持对抗态度的。）现在证明这种策略获得了巨大的成功。目前对《帝国》的评论和批判性研究的文章篇幅已大大超过它自身（大约 500 页）的篇幅。可惜，很少有人会意识到“诸众”不只是斯宾诺莎提出的一个哲学概念——诸众的民主政治——它还有一段挂在另一个名下的历史，是一个充满活力的集体实验的对象。他们从来没有怀疑过那时候提出的问题现在又会被重新提起，也从来没有怀疑过某种知性的复兴现在会发生在意大利。近来随同《帝国》一书在美国重新凸显的不仅是又一个美国文化时尚（“帝国”取代了“全球化”），目前还有一个勇于尝试的且具争议的当代社会实验室。维尔诺的《诸众的语法》是这种新凸显的另一个标志。

马里奥·特隆蒂在 1965 年出版的“拒绝的策略”中提醒说，不要太关注资本的力量或者认为资本为自身的利益遏制劳动力。工人本身在成为与资本相对立的阶级之前就已经是一个阶级。实际上，总是资本“设法利用工人对抗性的斗争意志作为自身发展的推动力”^⑤。《帝国》对这个论点做了拓展：正因为无产阶级“事实上发明了资本在未来总归会被迫采用的社会和生产形式”^⑥，所以，资本主义只能是反应性的，是意大利工人顽强抵制福特制的合理化工作方案，而不仅仅是技术创新才迫使资本进入非物质生产的后福

特制时代。

哈特和内格里强烈反对任何同时强调资本的创造力和工人阶级创造力的“混合动力论”。在这方面他们与德勒兹和加塔利对资本的分析有明显区别，而德勒兹和加塔利的资金流理论则被他们采用了（显然是《帝国》向《千高原》发出清晰的回响）。德勒兹和加塔利把资本看作流体，既别出心裁又十分恰当，在水流经的通道里放上障碍物，流体受阻回涌，然后继续向前流动。然而他们还强调，骗局总是出现在最后，它绝不敢随自己的惯势一直流下去。因为资本主义的极限底线就像股票市场，不受约束的疯狂总归会来的，要么在资本它自己流程的游戏里做变本加厉的解码时打败它，要么不断地置换自己与它们之间的位置。他们当然也承认意大利资本主义在去疆域化工人的压力下被迫做范式转变，但同时也指出它利用这种转变重新获得主动权，对工人阶级重新赋值，使他们变成相对稳定的社会构成。 12

这也是维尔诺在《诸众的语法》中的结论。回顾自治运动那个动乱的年代，维尔诺深知他们的斗争尚未达到目标。他说，政治对抗只有“表面上看起来的”激进冲突，因为自治论者都曾声明算不上是真正颠覆性的，只是对后福特制突变的一种期待。自治运动只不过是“不幸（被那些仍然等同于衰退的福特制范式的人）当作边缘人群、寄生人群的运动来对待了”，但实际上运动不是这样的。然而，现在维尔诺评价道，那只不过是后福特制诸众的一个“愤怒”和“粗鲁”

的版本，因为他们曾老是把非社会主义的诉求（拒绝工作、废除国家）和无产阶级革命混为一谈（他幽默地挖苦“许多人曾瞎扯革命”）。自治运动是一场失败的革命，对此，后福特制的范式就是答案。

但这是一个什么样的答案？并且后福特制时代用什么方法去实现自治运动用更直接的手段没有能实现的目标？新的无产阶级不取代工人阶级，而是扩展向那些他们的劳动正在受着资本剥削的所有人群。在后福特制的经济中，剩余价值不再提取自劳动在产品中的物化，而是存在于支付与不支付的心灵空闲时间的工作这两者之间的差额之中，而这种心灵空闲时间的工作源源不断地产生丰富的但不被承认的非物质劳动的果实。正如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Grundrisse*）中写的那样，劳动活动“不再是生产过程的主要作用者，而是站在生产过程的旁边”。诸众被定义为一种力量。在这个定义中，同其实际生产出了什么相比更偏重于其精湛的才艺，更偏重于其潜在的（potential）生产力 and 生产本身。这么说，这就是比以前所获得的更多的收获？工人们习惯了奴性的工作，只给他们留下刚够对身心做补充恢复的那点时间。现在他们的整个生命都是“活劳动”（live labor），一种无形的、不可分割的商品。今天所有诸众确实都成了屏幕上的监控信号。但是机器设备却再也不是“死劳动”（dead labor），它们是工人“活劳动”的一部分，现在“活劳动”插入“普遍智能”之中，将知识向整个公共领域

传播。工人越是具有创造性和适应性，就越能“实现自我价值”（self-valorizing），就越能将剩余的知识带给社会。诸众是生产过程科技突变的副产品，正如消费阶层曾经是商品从物品 [objects (les choses)] 转化成符号 (signs) 过程中的副产品一样。在后福特制时代，通常人际交往已成为生产合作的基础。那么，从纯粹的社会角度说，维尔诺是对的。这就是当初自治论者为了逃避劳动的奴役，尽情地体验生活而提倡“非保障”劳动和流浪的方式所试图达到的目的。 13

但从政治的角度看也正确吗？现在诸众在政治思想领域还是一个新的类别。那么，“政治”与自治运动相比又如何？维尔诺建议：这就是开放多元化的体验，探索非代议制的政治形式，但是要“冷静地、现实地”，不是立足于边缘化的地位。从某种意义上说，诸众通过主动参与知识社会化，最终会实现自治论的箴言——“在中心的边缘”。不管怎样，政治本身已经改变了。劳动、政治和智力不再分离，实际上它们已经成为可互换的，这就给了诸众一个去政治化的外貌。一切都已成为“述行语”（performative）。维尔诺在这里出色地展现了他的主要论点，精湛才艺（艺术、创作、演讲）和政治之间的类比。他们都是政治性的，因为他们都需要听众、观众或读者，都需要一个马克思称为“社会合作”的公开组织的空间，还都需要一种通用语言来交流。并且，他们又都是表演，因为他们从自己身上，而不是在任何终端产品里，发现了他们自己的成就感。

不错，这不是攻打冬宫，但自治论者也从来没有想过要那样的表现。当代诸众还不是一个阶级，它还不可能建立起自己的阶级意识，更遑论与资本家的阶级斗争。然而，正是它作为诸众的存在，才有别于“我们，人民”（人民总是放在国家这个基础上的）所说的“国家形式的危机”。《诸众的语法》用了大量篇幅详尽地阐释了当代生活方式不断变化的性质，但是没有对民族国家（nation-state）的危机做进一步详细阐述，而简单地将其归因于“诸众的离心特性”。在这一点上，《帝国》已有所体现。

- 哈特和内格里也采取“后现代”社会阶级的概念，但他们通过彻底改变其规模和意识形态的视野来试图偏移其日益增长的政治不满。对他们来说不仅是像诸众预示的国家形式的危机，而是目前由全球化形成的那个帝国形态的危机。帝国是一个导致重大转变的强大的政治综合体，这个重大转变
- 14 就是把政党和民族国家降到从属性角色的地位。先进的资本主义是非管制市场，它迫使现代各国将其主权转移到一个处于优势的实体，也就是一个由跨国公司的金字塔、跨政治组织和由仅剩的超级大国——美国领导的先进资本主义国家组成的“无首领、超国家的秩序”（美国很可能是帝国主义性质的，但是它不是帝国）。主权国失去了它的调停权，一个新的宪法程序开始出现，允许强制性国际监管的激增和扩散，以等级制、不平等对待等更复杂的形式取代国家和社会、统治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传统的对立。因此，哈特和内格里想